

贸易壁垒冲击下的企业出口能力提升 ——基于全球价值链主导权视角

叶 豪¹ 封肖云²

(1.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00083; 2. 济南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22)

摘 要: 在国际诸多不确定冲击下, 中国企业保持出口能力稳步提升, 对推动外贸“质升量稳”至关重要。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重构对国家或企业权力(power)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从企业增强全球价值链主导权视角, 探讨 GVC 参与如何助力企业应对外部冲击、提升出口能力。构建多产品企业理论模型, 引入 GVC 位置指数, 分析反倾销这一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能力的影响以及 GVC 位置的调节作用。借助多期 DID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反倾销倒逼了出口能力的提升, GVC 位置有进一步扩大效应。GVC 位置的扩大效应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小微企业、非钢铁行业, 且通过市场竞争、风险分散渠道发挥作用。在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趋势下, 企业应重视 GVC 位置的攀升, 以此增强全球价值链主导权, 更好地将外部冲击化为动力, 提升企业出口能力。

关键词: 贸易壁垒冲击; 企业出口能力; 全球价值链主导权; 市场竞争; 风险分散

中图分类号: F75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894 (2026) 04-0039-15

一、引言

近年来, 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 贸易冲击事件显著增多。尤其自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 全球关税与非关税水平普遍上升。根据 WTO 数据, 2023 年全球新出台贸易限制措施同比增长 35%, 2024 年贸易限制措施的覆盖范围更是大幅上升。^①其中美国对华平均关税在 2025 年比 2018 年前提高 18 倍。^②在国际循环诸多因素干扰下, 我国外贸展现较强韧性。2024 年货物进出口增长 3.8%, 出口增长 5.9%。2025 年全年货物进出口达到 45.47 万亿元, 同比增长 3.8%; 其中出口为 26.99 万亿元, 同比增长 6.1%, 持续为外贸“质升量稳”提供支撑。如何在多种外部冲击下巩固我国贸易竞争优势, 使其持续向好, 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作为外贸活动的主体, 企业出口能力不仅体现为既有出口规模和出口强度, 更体现为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中组织要素、调整产品、提升质量和拓展市场的综合能力(刘洪愧, 2022)。外部冲击越频繁, 企业越能在受限产品与替代产品、既有市场与新兴市场之间快速转换, 就越体现出企业出口的稳定性和韧性。与此同时, 全球价值链(GVC)正在由效率优先转向兼顾安全、韧性与区域重组, 企业所处的价值链位置会影响其附加值创造、资源整合和风险缓冲能力。由此, 企业能否在 GVC 中向更高端、更具控制力的环节攀升, 成为企业如何应对贸易壁垒的重要切入点。

基于上述背景, 本文探讨以下问题: 作为外部冲击的一种具体形式, 贸易壁垒对中国企业出口

作者简介: 叶豪,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封肖云, 济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贸易环境不确定背景下我国出口稳增长与质量提升对策研究”(项目编号: 19BJY188);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间品进口质量的影响及山东省进口结构优化研究”(项目编号: 19CJJ01); 山东省外事研究与智库课题“山东省与加勒比国家经贸合作潜力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202214)。

① WTO.Trade Monitoring Report[R].2024,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pr_e/factsheet_dec24_e.pdf.

② Bown, C. P.US-China Trade War Tariffs: An Up-to-Date Chart[EB/OL].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25-11-14.<https://www.piie.com/research/piie-charts/2019/us-china-trade-war-tariffs-date-chart>.

能力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这一影响过程中，企业的 GVC 参与发挥了何种作用？在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趋势下，企业又应当从哪方面调整策略以增强其在 GVC 中的主导权？

本文关于出口能力、全球价值链参与均是从企业层面的考察。基于此，在选取贸易壁垒冲击时，也考虑企业异质性特征，选择反倾销这一贸易壁垒冲击事件展开研究。^①反倾销因其隐蔽性、合法性和灵活性成为全球最主要的非关税壁垒，且中国始终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WTO 统计显示，2000~2024 年全球反倾销案件累计 6,422 起，其中涉及中国的 1,694 起，占比 26.4%，仅 2024 年涉及中国的就高达 43.5%。本文选取 2000~2014 年作为考察期，该时期涵盖了 GVC 从快速扩张到缓慢收缩的过程，转折点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李坤望等，2021），这有利于相对全面地考察 GVC 的作用，为当下 GVC 重构趋势下的企业决策提供客观借鉴。

本文重点从全球价值链主导权视角，探讨 GVC 参与如何助力企业应对外部贸易壁垒冲击、提升出口能力。关于 GVC 在外部需求冲击影响世界贸易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已有文献开始研究（Kejzar et al., 2022；李坤望和马天娇，2023），但聚焦具体贸易壁垒方式、从 GVC 视角考察传递作用，尚待深入探讨（赵忠秀和郑休休，2024），从企业层面考察出口能力的文献也少见。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 4 个方面：在研究视角上，聚焦企业出口能力这一微观指标，从 GVC 主导权角度考察贸易壁垒的传递效应；在理论层面，将企业的 GVC 位置纳入多产品企业生产函数并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其放大效应，拓展了现有异质性企业理论；在实证层面，采用多时点 DID 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发现反倾销对出口能力具有“倒逼效应”，且企业参与 GVC 的位置能扩大这一效应；在机制分析上，揭示 GVC 位置通过市场竞争和风险分散两条渠道发挥作用。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包括 4 类。第一类聚焦出口能力的内涵界定与测度方法。国外学者在此方面已有较为深入的探讨。Efrat 等（2018）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提出了出口适应性、出口创新性、出口不可预测性和出口任务灵活性 4 种动态出口能力；Miocevic（2021）进一步强调了企业的适应力与创新性这两大核心能力。相比之下，国内将出口能力进行量化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林令涛等（2019）通过是否出口、出口规模（出口额）以及出口强度（出口额与销售产值之比）来衡量企业出口能力；王海军等（2022）以出口额作为衡量指标。较为系统地对出口能力进行界定与测度的是刘洪愧（2022），他认为企业出口能力可以分解为出口转换能力、潜在供给能力和冲击应对能力，并提出了基于出口产品转换能力（核心产品遭遇反倾销时非核心产品的出口比重）、产品多样化（出口产品种类数）、出口产品质量等维度的测度方法。其中，出口转换能力和潜在供给能力属于企业长期积累的能力，是构成冲击应对能力的基础，而冲击应对能力则能够在国际市场冲击下为企业提供缓冲，帮助其调整资源配置以适应新环境并推动创新。本文借鉴刘洪愧（2022）对出口能力的内涵界定及其多维度测度框架。

第二类聚焦全球价值链（GVC）与权力塑造的关系。部分研究从国家层面探讨，并从国际权力、结构性权力等视角展开分析。余南平（2022）认为 GVC 可从 4 个方面塑造一国国际权力：参与 GVC 的规模优势与枢纽中心角色、参与位置与参与度、关键节点与链主地位形成的技术生态优势、服务贸易与无形资产软实力。国家间的结构性权力则产生于 GVC 增加值深层结构，并从经济层面映射国际格局（庞珣和何晴倩，2021）。另有一些研究关注企业层面。彭水军和李之旭（2024）提出从企业参与 GVC 位置这一视角增强企业在 GVC 中的主导权，这影响到企业“稳链”“扩链”“强

^① 2018 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是研究双边贸易壁垒的典型案列，但由于近年企业层面进出口和 GVC 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使得该主题下考虑企业异质性的研究较难实现。

链”的策略选择。余南平（2022）认为，全球价值链位置和参与度的提升反映了全球经济在企业间链接形态的变化，构成一国国际权力的重要方面。总体来看，现有文献多从国家层面展开。关于企业层面全球价值链主导权的测度，目前尚以全球价值链位置最合适。

第三类涉及贸易壁垒对出口的影响效应，本文主要聚焦反倾销的相关研究。一方面，反倾销措施可能引致涉案产品在实施国、目标国或第三国市场的贸易量和流向发生变化，从而产生贸易抑制效应（Lu et al., 2013；王孝松等，2015；蒋为和孙浦阳，2016）和贸易转移效应（Bown and Crowley, 2006）。另一方面，除调整市场外，反倾销措施还会倒逼企业调整产品，实施多产品出口策略（龙小宁等，2018），由此得到因市场调整和产品调整带来的正向作用。聚焦企业层面除出口外，相关研究还扩展到对企业生存率、生产率、成本加成、产品质量的考察（王孝松等，2015；杜威剑和李梦洁，2018）。目前从企业出口能力考察反倾销影响的文献只有刘洪愧（2022），但其仅探讨了中国遭受美国反倾销对中国企业出口能力的影响。张鹏杨等（2023）考察了中国遭受所有国家反倾销的情况，但重点是对出口韧性影响的探讨。

第四类关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贸易壁垒对出口的影响。该类文献主要聚焦 GVC 的“长鞭效应”，解释外部需求冲击负向影响世界贸易过程中，GVC 将影响效应进一步扩大的情况（Acemoglu et al., 2012）。相关研究多选用金融危机（Nagengast and Stehrer, 2016）、新冠疫情（Kejzar et al., 2022）等全球性事件作为外部冲击进行考察。李坤望和马天娇（2023）则综合考察金融危机与新冠疫情，探讨 GVC 在外部冲击影响全球贸易过程中的作用。目前选取贸易壁垒事件作为外部需求冲击事件、考察 GVC 扩大效应的文献尚较少。Ghodsi 和 Stehrer（2022）选取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两类贸易壁垒，考察它们影响出口过程中 GVC 发挥的作用。许家云等（2021）选取了反倾销这一贸易壁垒，考察其对多产品企业出口的影响，但对 GVC 作用仅稍有涉及，考察区间也仅为 2000~2007 年，没有覆盖 2008 年以后 GVC 缓慢收缩趋势下的情况。目前 GVC 视角下分析贸易壁垒传递效应的研究仍待深入探讨（赵忠秀和郑休休，2024）。

综上，关于贸易壁垒对一国贸易的影响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但鲜见从企业出口能力这一微观层面进行考察的文献。在此基础上，从全球价值链主导权视角考察贸易壁垒传递作用的研究也相对不足。在外部冲击叠加、全球价值链重构大环境下，企业可否通过增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权来提升风险应对能力，进而提升出口能力，仍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三、理论框架

本文基于 Bernard 等（2010，2011）构建一个多产品企业异质模型，同时引入 GVC 位置指数作为 GVC 主导权的考量，结合反倾销影响企业成本及市场竞争的现实特征，从理论层面解释反倾销影响企业出口能力的内在机理，探讨 GVC 位置指数在这一影响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一）消费

假定有两个国家 A 和 B，A 国生产异质性产品向 B 国出口。借鉴 Melitz（2003）的做法，B 国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CES 函数： $U_B = [\int_{\omega \in \Omega} q_B(\omega)^\rho d\omega]^{1/\rho}$ 。其中， $q_B(\omega)$ 指商品 ω 消费量， Ω 指消费可选择集， $\sigma = 1/(1-\rho) > 1$ 表示产品间替代弹性。预算约束为 $\int_{\omega \in \Omega} p_B(\omega) q_B(\omega) d\omega \leq E$ ，其中 $P_B = [\int_{\omega \in \Omega} p_B(\omega)^{1-\sigma} d\omega]^{-\frac{1}{1-\sigma}}$ 为综合价格指数。

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得到消费者的需求函数： $q_B(\omega) = EP_B^{\sigma-1} p_B(\omega)^{-\sigma}$ 。然后得到支出函数： $e_B(\omega) = R[\frac{p_B(\omega)}{P_B}]^{1-\sigma}$ 。

(二) 生产

参照 Bernard 等 (2010, 2011) 和何宇等 (2020) 的做法, 假定 A 国参与生产的劳动力有两种: 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 企业嵌入 GVC 位置的情况影响两种劳动力的投入比例。企业在 GVC 中的位置指数由 η 表示, η 值越大, 表示企业生产越向上游移动, 产品生产环节在更高端嵌入, 此时高技能劳动力的占比就越高。

设 A 国生产者生产两类商品 ω^m 和 ω^n , 企业在生产率 φ 和嵌入 GVC 位置指数 η 上存在异质性。借鉴 Dixit 等 (1982) 关于企业在连续生产的不同阶段进行移动的思想, 将贸易与企业在 GVC 中的位置指数结合, 并假定不同 GVC 位置上的企业高技术、低技术劳动比例不同, 得到出口企业的总成本函数如下:

$$TC(q^m, q^n; \varphi; \eta) = F + \sum_{i=m,n} \left[f_{Ai} + \frac{\tau_i q^i}{\varphi} \right] w_s^{\beta(\eta)} w_L^{1-\beta(\eta)}$$

其中 q^m 、 q^n 分别表示产品 ω^m 和 ω^n 的产量。在开放经济下, 企业进入出口市场需要支付贸易成本, 假设这一贸易成本包括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 F 、A 国产品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 f_i , 还包括表现为“冰山成本”的可变贸易成本 τ_i 。 w_s 是使用高技术劳动力的工资率, w_L 是使用低技术劳动力的工资率。假定 GVC 位置 η 越高, 就使用越高级的技术生产该产品; 假设存在“高技能劳动者工资更高”机制 (Morris and Western, 1999), 高技术劳动力的工资率和低技术劳动力的工资率之比会随 η 增大而增加 (Feenstra and Hanson, 2003), 由此可得 $\beta'(\eta) > 0$ 。 $\beta(\eta)$ 代表生产中的高技术劳动份额, 且 $0 < \beta(\eta) < 1$ 。生产率 φ 服从帕累托分布, 生产率的分布函数为 $G(\varphi) = 1 - (\frac{1}{\varphi})^k$, k 为形状参数, 在本文将规模参数简化为 1, 分布密度函数为连续函数 $g(\eta)$ 。参考李小平等 (2023) 的做法, 设定企业生产的产品 $i \in \{m, n\}$ 的质量 $\lambda_i \in [\lambda_1, \lambda_2]$, 质量下限 $\lambda_1 > 0$, 分布密度函数为连续函数 $\chi(\lambda)$ 。

(三) 均衡

根据一般均衡条件, 得到企业出口产品 i 的价格:

$$p_i(\varphi, \lambda) = \frac{\tau_i}{\rho \varphi \lambda} w_s^{\beta(\eta)} w_L^{1-\beta(\eta)} \quad (1)$$

收益函数为:

$$r_i(\varphi, \lambda) = \tau_i^{1-\sigma} R_i \left(\frac{\rho p_i \varphi \lambda}{w_s^{\beta(\eta)} w_L^{1-\beta(\eta)}} \right)^{\sigma-1} \quad (2)$$

利润函数为:

$$\pi_i(\varphi, \lambda) = \frac{r_i(\varphi, \lambda)}{\sigma} - f_i w_s^{\beta(\eta)} w_L^{1-\beta(\eta)} \quad (3)$$

当企业生产率 φ 给定, 在零利润条件下, 可确定产品 i 的质量临界值 $\lambda_i^*(\varphi)$, 并有下式成立:

$$r_i(\varphi, \lambda_i^*(\varphi)) = \sigma f_i w_s^{\beta(\eta)} w_L^{1-\beta(\eta)} \quad (4)$$

结合式 (2)、式 (4), 可知利润为零时产品质量临界值与生产率的关系:

$$\lambda_i^*(\varphi) = \frac{\tau_i \left(\frac{\sigma f_i w_s^{\beta(\eta)} w_L^{\sigma-\beta(\eta)} \sigma}{R_i} \right)^{\frac{1}{\sigma-1}}}{\rho p_i \varphi} \quad (5)$$

当企业生产的产品集包含质量大于质量临界点 $\lambda_i^*(\varphi)$ 的产品, 且企业的预期收益大于出口市场

进入成本时, 企业将向特定的市场出口, 利润函数为:

$$\pi(\varphi) = \int_{\lambda_i^*(\varphi)}^{\lambda_2} \left(\frac{r_i(\varphi)}{\sigma} - f_i w_s^{\beta(\eta)} w_L^{1-\beta(\eta)} \right) \chi(\lambda) d\lambda - F \quad (6)$$

(四) 模型分析

1. 反倾销的影响

各国反倾销措施主要为加征反倾销税、要求缴纳保证金或保函担保等, 前者使可变贸易成本增加, 后者使固定贸易成本增加。结合该事实特征, 构建反倾销事件的冲击。

假设产品 m 恰在质量临界点, 但在出口时遭受反倾销。如果反倾销措施为加征反倾销税, 则引起可变贸易成本的升高。根据式 (5), $\frac{d\lambda^*}{d\tau_m} > 0$, 意味着当 τ_m 上升时, 出口门槛值 λ^* 也上升, 进而出口产品质量总体上升, 冲击应对能力提高。如果反倾销措施为缴纳保证金或保函担保时, 则带来 F 和 f_i 的升高。根据式 (6), 这会导致利润的降低。两种情况均会使遭受反倾销产品 m 的出口下降。

那么, 产品 m 遭受反倾销后, 对产品 n 的出口影响如何? 借鉴刘洪愧 (2022) 生产关联成本的思想, 在规模报酬递增假设下, 当产品 m 产量下降时, m 产品边际成本上升, 企业会增加产品 n 的产量, 通过降低 n 产品边际成本的方式来降低企业总生产成本。根据这一思想, 产品 m 遭受反倾销后, 产品 n 的出口会增加, 即产品转换能力提高。

当产品 n 的出口增加效应足够大时, 企业总出口额有可能表现为增加。同理对产品种类 i 进行推广, 即当 $i: 2 \rightarrow \infty$ 时, 企业会生产并出口更多种类的产品, 出口产品多样化提升, 从而企业潜在供给能力提高。

2. 企业嵌入 GVC 位置的调节作用

根据企业生产总成本函数, η 表示企业嵌入 GVC 位置, η 越大, 企业生产越向上游移动。根据式 (5), η 上升会使 $\beta(\eta)$ 随之上升, 高技术劳动力工资占比提高, 企业生产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可得 $\frac{d}{d\eta} \frac{d\lambda^*}{d\tau_m} > 0$, 意味着企业嵌入 GVC 位置越高, 当产品 m 遭受反倾销时, τ_m 升高引致的出口临界值的上升效应就会越大。如果企业嵌入 GVC 位置越高, 当产品 m 遭受反倾销时, 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越大, 产品转换效应越大, 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

3. 中介作用机理分析

反倾销可通过市场竞争渠道与风险分散渠道影响企业的出口能力。

当中国企业遭受反倾销时, 贸易成本上升, 自身价格优势削弱, 海外业务一定程度上受阻; 部分企业为回避增加的出口成本, 会尝试扩大国内市场份额, 从而导致国内市场竞争加剧。行业竞争加剧会使企业更注重产品质量的提升 (马述忠和吴国杰, 2016)。当一种产品遭受反倾销时, 企业受竞争效应的影响会考虑转向其他产品出口, 并注重培养多种产品优势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当企业的 GVC 位置越高时, 企业在反倾销造成的激烈竞争中越能保持优势, 因为较高的 GVC 位置本身就代表着更高的增加值创造能力 (葛海燕等, 2021), 企业在激烈竞争中更有实力创新和调整产品结构, 从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促进出口产品多样化。

产品面临反倾销时, 为保证贸易结构平衡, 出口国会考虑调整出口市场, 加强向其他市场的出口来弥补反倾销造成的损失 (杜威剑和李梦洁, 2018)。这种风险分散的策略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出口产品多样化。同时, 企业在 GVC 中处于何种位置, 直接关系到企业的风险暴露、面临的市场

竞争程度以及创新环境，进而影响到它对外部需求变化的反应（彭水军和李之旭，2024）。GVC 位置越高的企业，自主研发能力越强，企业产品转换能力、市场多元化能力就越强，抗风险能力就越强。

根据反倾销的事实特征，反倾销一般仅由某国发起，反倾销措施也细化到某行业、某产品或者某企业。相较于其他外部冲击事件，^①反倾销措施冲击的是企业部分产品或者部分市场，从而企业有更多的产品调整、市场调整空间。因此，相较于其他外部冲击的负向影响，反倾销冲击更可能倒逼企业向非倾销产品调整，向更大的市场空间实施风险规避与成本规避策略，从而提升企业的出口能力。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反倾销能倒逼企业出口能力的提升，包括促进企业产品转换、推动出口产品多样化、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假设 2：在反倾销倒逼企业出口能力提升的过程中，企业参与 GVC 位置会扩大这一正向效应。

假设 3：反倾销措施对企业出口能力的倒逼效应主要通过市场竞争渠道和风险分散渠道实现，且 GVC 位置越高，这两种渠道的中介作用就越大。

四、实证研究

（一）模型构建

将遭受反倾销的企业作为处理组，未遭受反倾销的企业作为对照组。为解决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借鉴 Lu 等（2013）的做法，保留被反倾销产品所在的 HS4 项下的其他未受到反倾销指控的 HS6 产品，即删除 HS6 产品都未遭受反倾销的 HS4 产品。这样，在同一 HS4 位下的产品，通常具备一定的共性特征，如均属于同一行业、享受相似的国家政策、承受相近的供需波动、遵循类似的增长周期等。

考虑到各个企业遭受反倾销的政策时点不同，建立多期 DID 计量模型如下：

$$Ability_{it} = \beta_0 + \beta_1 AD_{it} + \beta X_{it} + \mu_i + \tau_t + \varepsilon_{it} \quad (7)$$

其中， $Ability_{it}$ 表示企业 i 在 t 年的出口能力。根据刘洪愧（2022）的做法，出口能力分别使用出口产品转换能力 ex_trans （核心产品被反倾销时非核心产品出口占企业总出口的比重^②）、产品多样化 ex_num （出口产品种类数）、出口产品质量^③ ex_quali 进行测度。 AD_{it} 表示实验组和对照组虚拟变量，企业 i 在 t 年受到反倾销调查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X_{it} 为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 Age 、融资约束 $Finan$ 、利息支出比重 $Inter$ 、资本密集度 $Capital$ 。 μ_i 、 τ_t 分别代表企业、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重点探讨贸易壁垒影响企业出口能力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主导权的调节作用。基于上文相关文献梳理，选取 GVC 位置对全球价值链主导权进行考量，并作为调节变量纳入基准模型：

$$Ability_{it} = \beta_0 + \beta_1 AD_{it} + \gamma_1 GVC_{it} + \gamma_2 (AD_{it} \times GVC_{it}) + \beta X_{it} + \mu_i + \tau_t + \varepsilon_{it} \quad (8)$$

GVC_{it} 为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 γ_1 和 γ_2 为变量系数，重点关注 γ_2 。通过调节效应判断企业 GVC 位置指数在贸易壁垒影响企业出口能力过程中的作用。参考 Koopman 等（2010）的测算方法，本文对企业 GVC 位置计算使用 $GVC = \ln(1 + DVAR) - \ln(1 + FVAR)$ 。其中， $DVAR = 1 - FVAR$ ， $FVAR$ 为国外增加值， $DVAR$ 为国内增加值。

① 如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外部冲击事件，对全球市场需求产生影响；中美贸易战、美国的“小院高墙”政策，对某行业内的所有企业产生冲击。

② 核心产品指出口占比第一的产品。对于出口转换能力而言，对非核心产品反倾销时并不会造成全局性影响，同时实际样本数少，故本文提取核心产品受反倾销的企业样本，研究企业转向非核心产品开发的能力。

③ 用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的方法计算得到，将产品层面加权汇总至企业层面的整体质量。

（二）数据处理说明

本文将《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全球反倾销数据库》匹配，时间为2000~2014年。第一步，处理来自世界银行的反倾销数据库。参考 Lu 等（2013）的做法，筛选各国对华反倾销结果为最终肯定裁决（Affirmative）的案例，且同一企业若两个案例的 HS6 位码相同或一个案例的 HS6 位码是另一个的子集，则剔除后发起案例，最终得到 2000~2014 年的案例数为 402 个。第二步，按企业名称、邮政编码和固定电话将《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并剔除异常值。然后将《中国海关数据库》HS8 位码的产品统一至 HS6 位码，与《全球反倾销数据库》HS6 位码匹配，识别出被反倾销的产品。第三步，识别企业是否被反倾销。企业出口产品中有一种是涉案产品，则认定为被反倾销企业，并将涉案产品裁决的最早年份设定为被反倾销年。

根据 Koopman（2010）测算企业 GVC 位置之前，本文根据海关与工企匹配数据库信息，首先计算各企业的国外附加值 $FVAR$ 。现有研究关于 $FVAR$ 的测算方法有 3 种：第一种假定加工贸易进出口值全部转移到出口商品，一般贸易进口商品以相同比例转移到一般贸易出口产品和国内销售产品（Upward et al., 2013）；第二种基于第一种，根据 BEC 和 HS 编码的对应关系，识别进口产品中消费品和资本品份额并进行剔除，计算 $FVAR$ ；第三种基于第二种考虑中间商（张杰等，2013；吕越等，2015）。本文在基准回归中采用更为完善的第三种方法，使用第一种和第二种测算方法检验稳健性。企业层面控制变量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x_trans	出口产品转换	286,786	0.496	0.451	0	1
ex_num	出口产品种类	286,786	2.529	3.089	1	173
ex_quali	出口产品质量	252,382	0.664	0.137	0	1
AD	是否遭受反倾销	286,786	0.742	0.438	0	1
GVC	全球价值链位置	286,786	0.517	0.358	-0.693	0.693
Age	企业年龄	286,724	10.103	12.010	0	161
$Finan$	融资约束	255,996	0.012	0.058	-7.28	17.82
$Inter$	利息支出比重	256,305	0.014	0.066	-9.635	19.116
$Capital$	资本密集度	260,731	3.87	1.428	-6.265	15.687

（三）基准回归

1. 反倾销对企业出口能力的影响

表 2 呈现了遭受反倾销对企业出口能力的影响，分别包括出口产品转换能力（非核心出口额占比）、出口产品多样化（出口产品种类数）、出口产品质量。列（1）中 AD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核心产品遭受反倾销后，非核心产品比例上升，这与已有文献结论一致（Lu et al., 2013；王孝松等，2015），验证了核心产品遭受反倾销推动了企业向非核心产品出口的转换。由此可推断，在企业产品转换策略影响下，反倾销应该对企业出口产品多样化存在正向效应。列（2）中 AD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证明这一正向效应确实存在。列（3）检验了反倾销对出口质量的影响效应，同样得到正向促进作用。反倾销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临界值，同时反倾销冲击促使企业从价格战逐步转为质量竞争。总之，国外对华反倾销能够对中国企业出口能力的提升产生倒逼作用，主要表现为促进产品转换、推动产品多样化、提升产品质量，这一结论与假设 1 一致，说明中国企业在遭受反倾销时具有积极应对外部冲击、变压力为动力的能力。

2. 全球价值链位置的调节作用

为有效论证 GVC 位置的调节作用，表 3 梳理了反倾销事件在不同 GVC 位置中的分布情况。

表 2 基准回归

变量	(1) 非核心出口 额占比 <i>ex_trans</i>	(2) 出口产品 种类数 <i>ex_num</i>	(3) 出口产品 质量 <i>ex_quali</i>	(4) 非核心出口 额占比 <i>ex_trans</i>	(5) 出口产品 种类数 <i>ex_num</i>	(6) 出口产品 质量 <i>ex_quali</i>
<i>AD</i>	0.084*** (34.93)	0.813*** (46.13)	0.004*** (4.48)	0.077*** (24.73)	0.756*** (26.40)	0.001 (0.88)
<i>AD</i> × <i>GVC</i>				0.016*** (3.58)	0.115** (2.58)	0.005** (2.4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度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i>N</i>	194,314	251,330	221,571	194,314	251,330	221,571
<i>R</i> ²	0.059	0.091	0.006	0.059	0.092	0.006

注：* *p*<0.1, ** *p*<0.05, *** *p*<0.01；使用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括号内为 *t* 值；下表同。列（4）~列（6）中 *GVC* 参与回归。

将 *GVC* 位置指数定义为高中低 3 类发现，反倾销事件在这 3 类位置指数中均有分布，说明在中高 *GVC* 位置同样存在企业遭受反倾销的情况。另外，关于 *GVC* 位置在反倾销影响企业出口过程中的调节作用，许家云等（2021）已有涉及，但未全面论证。

表 3 反倾销事件在不同 *GVC* 位置指数的分布

<i>GVC</i> 位置指数 区间	按 <i>GVC</i> 位置指数 分类	遭受反倾销 企业数
-0.693~-0.231	低	13,653
-0.231~0.231	中	15,162
0.231~0.693	高	183,852

表 2 列（4）~列（6）论证了 *GVC* 位置在反倾销影响企业出口能力过程中的调节作用。3 列中 *AD* × *GVC*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 *GVC* 位置扩大了反倾销对企业出口能力的倒逼作用：当企业面临贸易壁垒冲击时，企业参与 *GVC* 的位置越高，就越有助于推动企业出口能力的提升。从 *GVC* 主导权视角考察贸易壁垒的倒逼作用时，得到 *GVC* 位置攀升能进一步助力企业积极应对贸易壁垒冲击的结论，因此应将位置攀升作为增强 *GVC* 主导权的关键因素之一。

（四）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在进行政策冲击前，处理组与对照组并无显著差异，这是运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方法的基本前提。为确保满足这一条件，本研究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鉴于反倾销冲击的时间点存在差异，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时，设定相对时间虚拟变量，即以当前时期减去企业遭受反倾销的起始时期。构建如下模型检验平行趋势：

$$Ability_{i,t} = \beta_0 + \sum_{k=-4}^5 \beta_k AD_{i,t+k} + \beta X_{i,t} + \mu_i + \tau_t + \varepsilon_{it} \tag{9}$$

其中， β_k 识别的是相对于基准时间点，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出口能力有无显著差异。根据样本特征，将大于或等于 +5 的相对年份设置为 +5，将 -1 期设为基准期。平行趋势检验如图 1~图 3 所示。可以看出，接受反倾销冲击前的相对时间虚拟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在被反倾销前，处理组与对照组在出口能力上无显著差异，符合平行趋势假设。此外，政策冲击后的回归系数均显著大于 0，说明反倾销对中国企业出口能力的影响具有较长时间的持续性。

2. 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参考许家云等（2021）的做法，采用动态 *GMM* 方法进行检验，通过缓解因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提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AD* 系数仍然显著，交互项系数正显著，表明处理内生后结论依然稳健。*AR*（1）的 *P* 值均为 0.000，*AR*（2）值均大于 0.05，弱工具变量检验通过。^①

① 出于篇幅考虑，反映出口能力的 3 个变量的滞后一期回归系数未汇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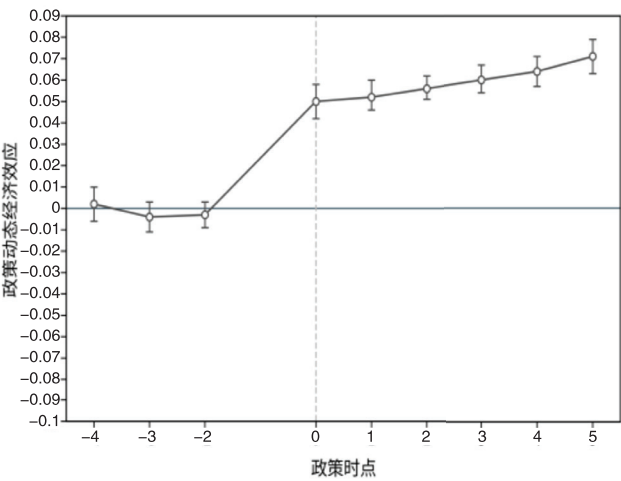


图 1 非核心出口额占比平行趋势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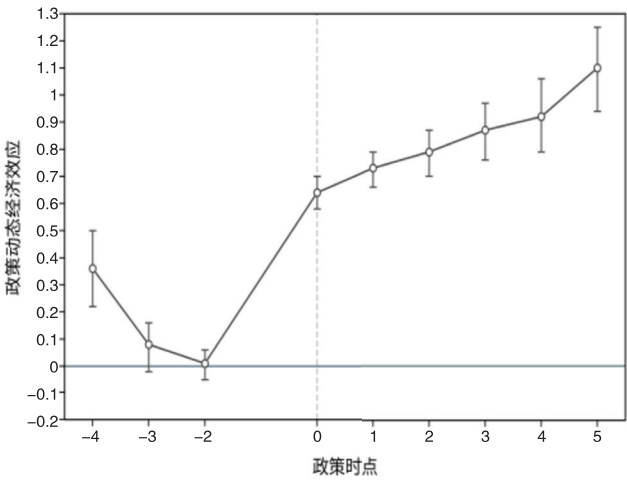


图 2 出口产品种类数平行趋势检验

3. 安慰剂检验

为了确认评估结果是否显著受到反倾销政策以外的其他非观测因素或遗漏变量的影响，笔者进行安慰剂检验，并虚构处理组进行重新估算。由于企业遭受反倾销的时间存在差异，需要随机选择被反倾销的企业以及随机生成参与时间。因此，本文构建了企业一年份层面的随机实验，在 212,714 个受反倾销样本中随机选取受反倾销的企业样本及政策时间，并重复此过程 500 次，据以绘制 DID 估计系数核密度及 P 值分布图。图 4~ 图 6 显示，虚假实验中生成的 DID 估计系数集中分布在 0 附近，且大部分系数的 P 值远大于 0.05，并符合正态分布，说明“伪实验组”并不存在政策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模型设定不存在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基准回归结论稳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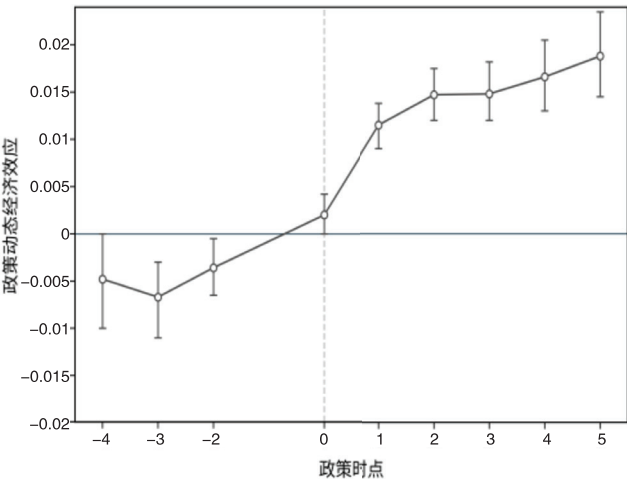


图 3 出口产品质量平行趋势检验

4.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 (PSM-DID) 模型估计

为避免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在样本处理时，已借鉴 Lu 等 (2013) 的做法，保留了被反倾销产品所在的 HS4 项下其他未受到反倾销指控的 HS6 产品，同时删除 HS6 产品都没有受到反倾销影响的 HS4 产品，保证了同一个 HS4 项下的产品具有共性特征。该部分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 (PSM-DID) 方法处理该问题，以证明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最近邻匹配方法，基于

表 4 动态 GMM 处理内生问题

变量	(1) <i>ex_trans</i>	(2) <i>ex_num</i>	(3) <i>ex_quali</i>	(4) <i>ex_trans</i>	(5) <i>ex_num</i>	(6) <i>ex_quali</i>
<i>AD</i>	0.192*** (22.90)	1.481*** (35.57)	0.018** (2.27)	0.200*** (15.35)	1.641*** (22.20)	0.276*** (3.20)
<i>AD</i> × <i>GVC</i>				0.050*** (3.17)	0.457*** (4.03)	0.425*** (3.1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02,759	152,259	132,928	102,759	152,259	132,9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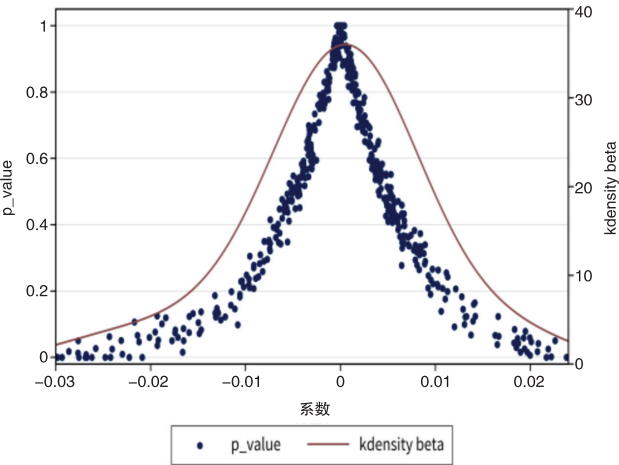


图4 非核心产品出口额占比安慰剂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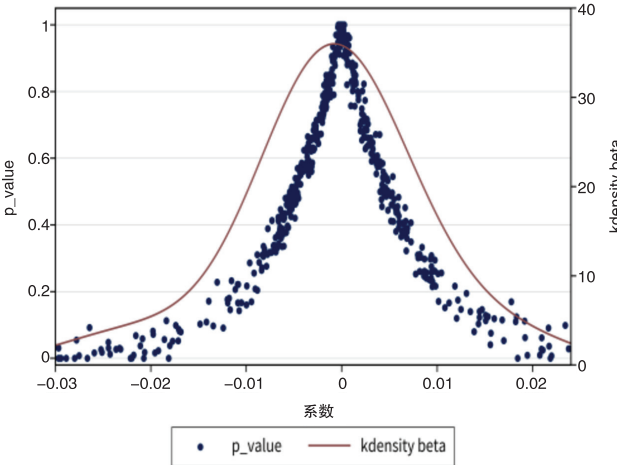


图5 出口产品种类数安慰剂检验

（左纵轴为P值，右纵轴为核密度估计系数；图5和图6同）

logit 模型估计企业被选择为受反倾销企业的概率。匹配变量的选择参考张鹏杨等（2023）的做法，选取企业规模等协变量来控制企业层面特征，并采用匹配后的样本对模型重新估计。表5列（1）~列（3）为最近邻匹配下多时点PSM-DID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AD与交互项 $AD \times GVC$ 系数均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另外，本文还使用了卡尺近邻匹配法为遭受反倾销的企业寻找对照组企业，基于新的配对样本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列（4）~列（6）所示，依然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

5. 按FVAR不同测算方法计算GVC位置

前文指出关于企业FVAR的测算主要有3种方法。本文在基准回归中使用了第三种方法，本部分使用第一种和第二种方法作为替代指标，回归结果见表6。所有列中AD与交互项 $AD \times GVC$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与基本回归结论一致，GVC位置的正向调节作用依然存在。

6. 排除其他冲击干扰

在本文样本区间2000~2014年内，不可忽视的冲击事件是全球金融危机。参照王孝松等（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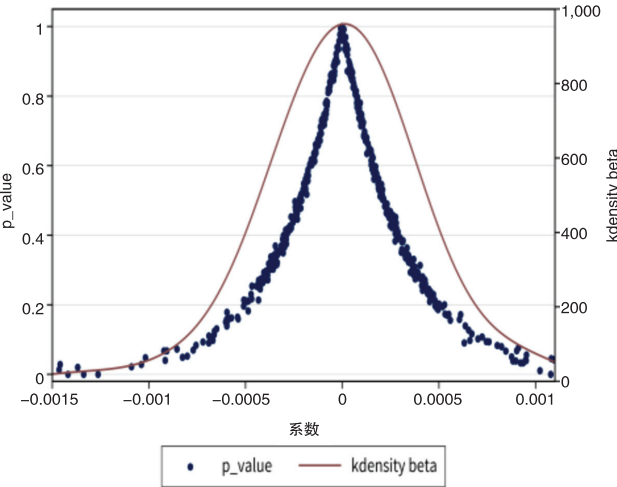


图6 出口产品质量安慰剂检验

表5 PSM-DID模型处理选择性偏差

变量	最近邻匹配			卡尺近邻匹配		
	(1) ex_trans	(2) ex_num	(3) ex_quali	(4) ex_trans	(5) ex_num	(6) ex_quali
AD	0.077*** (35.07)	0.754*** (31.14)	0.001 (1.08)	0.077*** (35.10)	0.755*** (31.19)	0.001 (1.10)
$AD \times GVC$	0.016*** (4.81)	0.119*** (3.18)	0.006*** (3.78)	0.015*** (4.77)	0.116*** (3.11)	0.006*** (3.7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94,306	251,323	221,567	194,289	251,299	221,553
R ²	0.059	0.092	0.007	0.059	0.092	0.007

的做法，在回归中加入金融危机虚拟变量及交叉项，检验结果见表 7。 AD 与 $AD \times GVC$ 的系数依然正向显著，说明在剔除金融危机影响后，遭受反倾销对企业出口转换、出口产品多样化、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作用依然稳健， GVC 位置依然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表 6 使用 FVAR 不同测算方法计算 GVC 位置

变量	GVC1			GVC2		
	(1) ex_trans	(2) ex_num	(3) ex_quali	(4) ex_trans	(5) ex_num	(6) ex_quali
AD	0.077*** (23.75)	0.748*** (24.65)	0.001 (0.81)	0.076*** (23.38)	0.739*** (24.18)	0.001 (0.62)
$AD \times GVC$	0.016*** (3.42)	0.116** (2.42)	0.006** (2.40)	0.017*** (3.65)	0.133*** (2.74)	0.006*** (2.5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89,957	246,306	217,736	189,957	246,306	217,736
R^2	0.059	0.092	0.006	0.059	0.092	0.006

(五) 异质性检验

1. 企业所有制

考虑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抵御外部风险能力的差异，分组考察两者的异质性。根据企业登记类型，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表 8 列(1)~列(3)、列(7)~列(9)显示反倾销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出口能力均有显著提升。但从列(4)~列(6)、列(10)~列(12)看， GVC 位置的扩大效应只在非国有企业中显现，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

2. 企业规模

根据国家统计局标准区分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回归结果见表 9。列(1)~列(3)、列(7)~列(9)显示，反倾销对所有类型的企业出口能力产生了促进作用。从列(4)~列(6)、列(10)~列(12)中 $AD \times GVC$ 的系数看，对于小微企业， GVC 位置在反倾销提升企业出口能力过程中产生显著的扩大效应。但对于大中型企业， GVC 位置的扩大效应仅体现在出口产品转换能力上。可能的原因是，小微企业活力更强，市

表 7 排除金融危机的影响

变量	(1) ex_trans	(2) ex_num	(3) ex_quali
AD	0.060*** (15.61)	0.316*** (4.53)	0.005*** (2.88)
$AD \times GVC$	0.016*** (2.86)	0.430*** (4.11)	0.007*** (2.79)
$AD \times dum2008$	-0.034*** (-8.47)	-0.765*** (-7.65)	-0.006*** (-3.00)
$AD \times GVC \times dum2008$	-0.005 (-0.86)	-0.515*** (-3.23)	-0.012*** (-5.36)
dum	0.129*** (15.83)	2.815*** (12.44)	0.008 (1.5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年度效应	是	是	是
N	194,314	251,330	221,571
R^2	0.060	0.092	0.006

表 8 企业所有制

变量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1) ex_trans	(2) ex_num	(3) ex_quali	(4) ex_trans	(5) ex_num	(6) ex_quali	(7) ex_trans	(8) ex_num	(9) ex_quali	(10) ex_trans	(11) ex_num	(12) ex_quali
AD	0.100*** (7.90)	0.962*** (6.48)	0.011* (2.03)	0.108*** (5.66)	0.485* (1.99)	0.006 (0.50)	0.08*** (33.99)	0.81*** (46.31)	0.004*** (4.23)	0.08*** (4.11)	0.756*** (6.38)	0.001 (0.73)
$AD \times GVC$				-0.014 (-0.55)	0.85* (2.13)	0.01 (0.56)				0.016*** (3.64)	0.097* (2.18)	0.01* (2.4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5,631	7,098	5,804	5,631	7,098	5,804	188,683	244,579	216,079	188,683	244,579	216,079
R^2	0.073	0.063	0.014	0.073	0.064	0.014	0.058	0.097	0.006	0.059	0.098	0.006

场敏感度高,机制灵活,更具效率,在外部反倾销的冲击下更具有推陈出新的魄力,其GVC位置越高,说明产品的附加值越高,研发能力越强,在掌握市场需求、抓住外部机会进行多元化产品的开发经营方面更具有灵活性,“船小好调头”;而大中型企业规模大,在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放弃原有模式、迎合新市场的难度较高,故GVC的扩大效应并不如小微企业显著。

表 9 企业规模

变量	大中型企业						小微企业					
	(1) <i>ex_trans</i>	(2) <i>ex_num</i>	(3) <i>ex_quali</i>	(4) <i>ex_trans</i>	(5) <i>ex_num</i>	(6) <i>ex_quali</i>	(7) <i>ex_trans</i>	(8) <i>ex_num</i>	(9) <i>ex_quali</i>	(10) <i>ex_trans</i>	(11) <i>ex_num</i>	(12) <i>ex_quali</i>
<i>AD</i>	0.087*** (20.61)	0.876*** (23.98)	0.005*** (3.56)	0.081*** (16.31)	0.835*** (15.75)	0.004* (2.11)	0.085*** (25.87)	0.753*** (46.40)	0.002* (1.76)	0.075*** (16.35)	0.659*** (25.17)	-0.001 (-0.53)
<i>AD</i> × <i>GVC</i>				0.015** (2.18)	0.095 (1.11)	0.001 (0.31)				0.019*** (2.97)	0.181*** (4.71)	0.006* (1.8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85,592	114,518	103,259	85,592	114,518	103,259	108,722	137,159	118,624	108,722	137,159	118,624
R ²	0.063	0.095	0.002	0.063	0.095	0.004	0.050	0.093	0.010	0.050	0.093	0.010

3. 企业所在行业

我国钢铁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又是频繁遭受反倾销的行业。表 10 对钢铁行业与非钢铁行业进行回归,列(1)~列(3)、列(7)~列(9)显示,变量*exp_trans*和*exp_num*对*AD*回归系数正显著,说明钢铁行业与非钢铁行业在遭受反倾销后都有出口转换能力和潜在出口供给能力(产品多样化)的提升。但是,反倾销对出口质量的提升只体现在非钢铁行业,钢铁行业遭遇反倾销对出口质量提升作用不显著。原因可能是钢铁行业作为国内大宗商品行业,市场份额较高,这代表着更高的议价能力和垄断能力,企业更可能将价格向对自身有利的方向调整,同时产生对质量提升的惰性(徐文海等,2022)。列(4)~列(6)、列(10)~列(12)显示,非钢铁行业GVC位置的攀升在反倾销提升企业出口能力过程中有更大的促进效应,但该效应在钢铁行业不存在。

表 10 企业所在行业

变量	钢铁行业						非钢铁行业					
	(1) <i>ex_trans</i>	(2) <i>ex_num</i>	(3) <i>ex_quali</i>	(4) <i>ex_trans</i>	(5) <i>ex_num</i>	(6) <i>ex_quali</i>	(7) <i>ex_trans</i>	(8) <i>ex_num</i>	(9) <i>ex_quali</i>	(10) <i>ex_trans</i>	(11) <i>ex_num</i>	(12) <i>ex_quali</i>
<i>AD</i>	0.070*** (9.52)	0.629*** (11.82)	0.001 (0.34)	0.073*** (6.31)	0.549*** (11.76)	0.001 (0.07)	0.086*** (33.40)	0.836*** (44.96)	0.004*** (4.41)	0.078*** (24.05)	0.788*** (25.88)	0.001 (0.64)
<i>AD</i> × <i>GVC</i>				-0.008 (-0.46)	0.156 (1.23)	0.001 (0.10)				0.017*** (3.83)	0.098* (2.06)	0.006** (2.7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20,631	24,997	19,708	20,631	24,997	19,708	173,683	226,680	202,175	173,683	226,680	202,175
R ²	0.073	0.156	0.010	0.073	0.156	0.010	0.056	0.086	0.005	0.057	0.087	0.006

五、机制检验

上文论证了在国外反倾销倒逼企业出口能力提升的过程中,企业参与GVC位置扩大了这一正向效应。本部分借助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温忠麟等,2006),参考王孝松等(2022)的研究,分析GVC位置通过市场竞争和风险分散渠道,发挥上述扩大效应,运用图7的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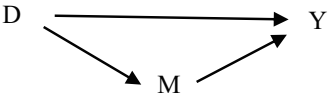


图 7 江艇(2022)两步法

步法进行检验（江艇，2022）。在 $D \rightarrow M \rightarrow Y$ 的因果链条中， Y 是结果变量， D 是处理变量， M 是中介变量。结合经济学理论与相关文献研究，提出一个或几个能够反映 D 对 Y 的作用渠道的中介变量 M 后， M 对 Y 的影响应该是直接而显然的，在此主要实证识别 D 对 M 的因果关系。本文借鉴温忠麟等（2006）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处理变量 D 应该包括反倾销 AD 、交叉项 $AD \times GVC$ 。

（一）市场竞争渠道

在反倾销对企业出口能力的影响过程中， GVC 位置可通过市场竞争渠道发挥调节作用。具体而言，企业遭受反倾销后，所在行业内的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国外市场的限制迫使企业转向国内市场，同时目标国对企业实施的贸易制裁也可能使企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对国内市场和其他国家市场的争夺会加大行业竞争。市场竞争程度的提升，一方面迫使企业开展更多的研发创新，从而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马述忠和吴国杰，2016）；另一方面，遭受反倾销产品在国内市场和其他市场竞争程度的提升，会促使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加强非核心产品的出口，增加出口产品种类。

本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 HHI 来测度市场竞争程度，分别使用企业收入在行业占比的平方和、企业出口额在行业占比的平方和，衡量企业所在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竞争程度， HHI 指数越低，市场竞争就越激烈。根据表 11 列（1）~ 列（2）， AD 系数显著为负，反倾销使得赫芬达尔指数降低，说明市场竞争加剧；同时，两列中交互项 $AD \times GVC$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 GVC 位置缓解了 AD 对 HHI 的负向作用。可以理解为， GVC 位置越高，企业在反倾销造成的激烈市场竞争中越能保持垄断优势，因为企业较高的价值链位置本身就代表着企业更高的增加值创造能力（葛海燕等，2021）。这种竞争优势使企业在激烈竞争中更有实力开展研发创新活动和调整产品结构，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拓展更多产品出口、促进出口产品多样化。

（二）风险分散渠道

出口市场多元化带来的风险分散效应有助于企业出口能力的提高。从企业主观策略看，外部需求冲击会加强企业的风险分散动机，增强企业寻求多元化出口市场的意愿。因为更多的贸易伙伴会降低企业对单一市场的依赖，降低企业受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Esposito，2022）。由此，多元化出口市场策略会带动出口扩展边际的提升；弱化来自单一市场的出口波动性，优化出口市场布局，加强产品互补开发；风险分散后，出口市场环境的平稳性得到提升，利于产品质量的提升。

本文使用产品出口国数量衡量出口市场多元化，代表风险分散渠道。从表 11 列（3）可知， AD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反倾销政策下，企业倾向于拓展新的出口市场以分散风险； $AD \times GVC$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 GVC 位置越高，企业风险分散能力越强，出口市场越多元化，就越有助于提升企业出口能力。

表 11 机制检验

变量	(1) 赫芬达尔指数（按企业收入）	(2) 赫芬达尔指数（按企业出口额）	(3) 市场多元化（出口国数量）
AD	-0.003*** (-9.83)	-0.003*** (-7.07)	0.101*** (14.52)
$AD \times GVC$	0.002*** (4.44)	0.002** (2.55)	0.085*** (8.0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N	251,330	251,330	251,330
R^2	0.078	0.199	0.032

六、结论与建议

在当前贸易壁垒冲击增加、全球贸易持续疲弱、国际循环诸多因素干扰下，从全球价值链主导权视角考察企业如何应对贸易壁垒冲击、提升出口能力，不仅是对已有研究的有益补充，对当下推动我国外贸实现“质升量稳”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借助多产品企业出口模型，引入 GVC 位置指数，推导分析反倾销影响企业出口能力过程中 GVC 位置的调节作用。实证

研究采用多期 DID 方法,发现遭受反倾销能够倒逼中国企业出口能力提升,企业 GVC 位置又扩大了这一倒逼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GVC 位置的扩大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小微企业、钢铁行业外的其他行业,在国有企业、大中型企业、钢铁行业中没有呈现。另外,GVC 位置的扩大效应主要通过市场竞争渠道和风险分散渠道实现。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我国企业能够积极应对贸易壁垒冲击、提升企业出口能力,可考虑在探索新产品、产品多样化、出口质量提升等方面下功夫。在当前外部不确定因素叠加情况下,政府应鼓励企业培养产品多样化和市场多元化意识,加强市场挖掘,一方面做好产品出口国的多元化以分散风险,另一方面注重资源合理配置,根据外部环境变化适当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做到出口能力的全面提升。

第二,在当前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趋势下,企业应更加重视 GVC 位置的攀升,这是增强全球价值链主导权的关键因素,能助其将外部冲击化为动力,提升企业出口能力。具体来说,充分考虑所在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模式及特性,持续提升自身的产品附加值,形成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高层次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

第三,市场竞争和风险分散是 GVC 位置发挥扩大效应的两条渠道。政府要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借助两条渠道助力企业在价值链位置的攀升;遭受反倾销冲击时,应合理引导企业,借助 GVC 位置的攀升积极应对外部冲击。同时,企业亦不可坐等反倾销对出口能力倒逼效应的显现,因为市场的优胜劣汰与企业效率、企业策略调整息息相关。企业在遭受外部冲击时,要适时调整产品结构和市场策略,合理配置资源,借助 GVC 位置的攀升带来的条件优势,努力跨越更高的产品出口成本门槛与质量门槛,只有这样才能在反倾销的外部冲击下愈挫愈勇,持续提升出口能力。

参考文献:

- [1] 杜威剑,李梦洁.反倾销对多产品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18(9).
- [2] 葛海燕,张少军,丁晓强.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及驱动因素——融合经济地位与技术地位的综合测度[J].国际贸易问题,2021(9).
- [3] 何宇,张建华,陈珍珍.贸易冲突与合作: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解释[J].中国工业经济,2020(3).
- [4] 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22(5).
- [5] 蒋为,孙浦阳.美国对华反倾销、企业异质性与出口绩效[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7).
- [6] 李坤望,马天娇,黄春媛.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及影响[J].经济学家,2021(11).
- [7] 李坤望,马天娇.外部需求冲击与贸易下滑——基于全球价值链重构视角的实证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23(1).
- [8] 李小平,余娟娟,余东升,等.跨境电商与企业出口产品转换[J].经济研究,2023(1).
- [9] 林令涛,刘海洋,逯宇铎.进口中间品、技术匹配与企业出口能力[J].经济科学,2019(5).
- [10] 刘洪愧.不确定冲击下中国企业出口能力研究[J].经济研究,2022(10).
- [11] 龙小宁,方菲菲,Chandra Piyush.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出口产品种类溢出效应探究[J].世界经济,2018(5).
- [12] 吕越,罗伟,刘斌.异质性企业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基于效率和融资的视角[J].世界经济,2015(8).
- [13] 马述忠,吴国杰.中间品进口、贸易类型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11).
- [14] 庞珣,何晴倩.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与国际格局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2021(9).
- [15] 彭水军,李之旭.外部需求与企业上游供应链调整:稳链保供还是扩链强链[J].世界经济,2024(2).
- [16] 施炳展,邵文波.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测算及其决定因素——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的微观视角[J].管理世界,2014(9).
- [17] 王海军,向文婧,杨虎.对外援助对企业出口能力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的经验[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5).
- [18] 王孝松,陈金至,武院,等.汇率波动、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中国企业出口[J].中国工业经济,2022(10).
- [19] 王孝松,翟光宇,林发勤.反倾销对中国出口的抑制效应探究[J].世界经济,2015(5).
- [20]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有中介的调节变量和有调节的中介变量[J].心理学报,2006(3).
- [21] 许家云,张俊美,刘竹青.遭遇反倾销与多产品企业的出口行为——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J].金融研究,2021(5).

- [22] 徐文海,葛新庭,徐小聪.反倾销引起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质量和价格的影响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2(8).
- [23] 余南平.全球价值链对国际权力的形塑及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22(12).
- [24] 张杰,陈志远,刘元春.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算与变化机制[J].经济研究,2013(10).
- [25] 张鹏杨,刘维刚,唐宜红.贸易摩擦下企业出口韧性提升:数字化转型的作用[J].中国工业经济,2023(5).
- [26] 赵忠秀,郑休休.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新议程[J].国际贸易问题,2024(1).
- [27] Acemoglu, D.,Carvalho, V. M.,Ozdaglar, A.,et al.The Network Origins of Aggregate Fluctuations[J].Econometrica,2012,80(5).
- [28] Bernard, A. B.,Redding, S. J.,Schott, P. K.Multiple-product Firms and Product Switching[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100(1).
- [29] Bernard, A. B.,Redding, S. J.,Schott, P. K.Multisector Firms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1,126(3).
- [30] Bown, C. P., Crowley, M. A.Policy Externalities:How US Antidumping Affects Japanese Exports to the EU[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6,22(3).
- [31] Dixit, A. K., Grossman, G. M.Trade and Protection with Multistage Production[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2,49(4).
- [32] Efrat, K.,Hughes, P.,Nemkova, E.,et al.Leveraging of Dynamic Export Capabilities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Performance Consequences:Evidence from China[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8,84.
- [33] Esposito, F.Demand Risk and Diversific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22,135.
- [34] Feenstra, R. C.,Hanson, G. H.Global Production Sharing and Rising Inequality:A Survey of Trade and Wages[M].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3.
- [35] Ghodsi, M.,Stehrer, R.Trade Policy and Global Value Chains:Tariffs versus Non-tariff Measures[J].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2022, 58(3).
- [36] Kejžar, K. Z.,Velić, A.,Damijan, J. P.COVID-19,Trade Collapse and GVC Linkages:European Experience[J].The World Economy,2022,45(11).
- [37] Koopman, R.,Powers, W.,Wang, Z.,et al.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R]. NBER Working Paper,No.16426,2010.
- [38] Lu, Y.,Tao, Z.,Zhang, Y.How Do Exporters Respond to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3,91(2).
- [39] Melitz, M. J.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Econometrica,2003,71(6).
- [40] Miočević, D.Dynamic Exporting Capabilities and SME's Profitability:Conditional Effects of Market and Product Diversific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21,136.
- [41] Morris, M.,Western, B.Inequality in Earnings at the Clos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9,25(1).
- [42] Nagengast, A. J.,Stehrer, R.The Great Collapse in Value Added Trade[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6,24(2).
- [43] Upward, R.,Wang, Z.,Zheng, J.Weighing China's Export Basket:The Domestic Content and Technology Intensity of Chinese Exports[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3,41(2).

Enhancing Enterprise Export Capability under Trade Barrier Shocks: A Perspective on Dominant Power in Global Value Chains

YE Hao FENG Xiaoyun

Abstract: Amid increasing uncertainty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e steady enhance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export capability is crucial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stabilizing the scale of foreign trade. The forma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have profoundly reshaped the power of countries and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minant power in GVCs,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GVC participation helps enterprises cope with external shocks and enhance export capability. By constructing a multi-product enterprise model and introducing a GVC position index,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anti-dumping measures on enterprise export capability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VC position. Using a multi-period DID mod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anti-dumping measures exert a reverse-pressure effect that improves enterprise export capability, and a higher GVC position further amplifies this effect. The amplification effect is mainly found among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nd non-steel industries, and operates through the channels of market competition and risk diversifica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celerated GVC restructuring, enterprises should attach greater importance to upgrading their GVC position, 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ir dominant power in GVCs, transforming external pressure into development momentum, and improving export capability.

Keywords: trade barriers shocks; enterprise export capability; dominant power in global value chains; market competition; risk diversification

(责任编辑: 张建华)